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理论之声

理论驿站

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质量发展

□ 权衡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五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就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作出部署。这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指明了主攻方向，提出了战略举措。

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也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实现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新发展格局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相互匹配和相互适应。过去几年，我们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重点通过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侧的质量、效率和效益，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但是，任何高质量的供给最终都需要依靠有效需求来实现。显然，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为了更好发挥内需体系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撑，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其次，新发展格局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高质量发展也需要加快高水平开

放，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也是高水平开放的发展，特别需要通过转换发展动力，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这就需要加快实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一系列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需要融入全球开放创新体系和全球创新网络，以开放引领创新，以开放促进发展。第三，新发展格局更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实现经济规模和体量跃升，奠定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随着国际环境条件和国内发展阶段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际经验表明，建立强大的内需体系和国内市场，是该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纵观“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乃至到2035年的远景目标，都需要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扩大内需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质量发展，需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首先，要积极畅通国内大循环。进一步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加速国民经济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产业链与供应链、上游与中下游、大中小企业等之间有机循环。实现国内大循环畅通，本身就是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巨大的市场优势、空间优势和发展韧性的重要体现。畅通国内大循环，要求我们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重点是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真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效率和效益，实现高质量发展。其次，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国人口规模巨大，消费市场空间优势明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需要扩大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要积极扩大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三，要让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关键作用。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扩大再生产或走投资驱动增长的老路，更不是搞盲目和重复的无效投资，而是要根据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趋势和规律，提升投资需求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实施精准投资、有效投资，积极扩大有效需求。第四，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自由流动和资源再配置，以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引领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防控风险须聚焦重点、抓纲带目

防控风险主要是防范化解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民族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比如，在政治安全方面，防止和消除敌对势力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在经济安全方面，重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和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科技安全方面，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从根本上改变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生态安全方面，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的生态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在外部环境方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在党的建设方面，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有效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等等。

在重点防控以上风险的同时，也要防范化解其他领域重大风险，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

全问题等。比如，在粮食安全方面，解决好吃饭问题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必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应认识到，各种矛盾风险挑战、各类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如果防范不及时，应对不得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全局性的矛盾风险挑战。总之，在风险防控方面，要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着力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累积叠加。

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质量发展，还应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一是要让新技术助力新消费，推进消费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既需要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也需要加快消费转型和升级。为此，要发挥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引领新消费业态。二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侧与需求侧有机结合、紧密匹配。要从供给侧发力，以高质量供给适应和引领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三是要以制度创新为抓手，优化消费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破除阻碍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消费政策的引导作用，培育和形成有助于加快养老消

费、医疗消费、教育消费等在内的消费环境。

让“双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发挥新发展格局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就意味着开放要从制造业为主体转向服务业和制造业开放并重，从沿海开放为主转向沿海、内陆以及陆海联动开放并重。要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更加注重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经贸规则，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影响力。其次，要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一方面，要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我国内需优势和规模优势，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发挥全球创新网络在中国开放合作、开放创新中的作用。第三，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体制机制条件。一方面，要全面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特别是在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等方面继续发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于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条件；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于高水平开放的体制机制条件。

（作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坚持系统观念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并对风险防控工作作出重大战略安排。在分析发展环境时，要求“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在提出发展原则时，要求“坚持系统观念”“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在设定发展目标时，要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在部署重点任务时，要求“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这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中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防控重大风险是新征程中的重大问题

防控重大风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底线思维。系统观念就是把事物看作由各种要素基于一定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要求站在整体和全局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底线思维就是客观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思维方式。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年。我们在新征程中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提高底线思维能力，才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国际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国际经

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国内方面，我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尚存在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面对当前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只有这样，才能在新征程中推动民族复兴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坚毅前行。

防控重大风险必须有系统性对策

防控重大风险，需要前瞻性思考、系统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关键在于办好自己事，提高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在新征程中，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and 抵御风险能力。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

增强忧患意识。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在新征程中，应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要未雨绸缪、妥善应对，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

完善制度体系。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风雨

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在新征程中，应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融合转化，善于利用制度威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冲击。要有前瞻性风险应对预案，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为防控全局性风险提供制度保障。

练就过硬本领

防控重大风险，还需要以过硬本领作为执行保障。在新征程中，应以辩证思维看待新机遇新挑战，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领导干部应自觉肩负起时代使命，努力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化解风险，开创发展新局面。

发扬斗争精神

同困难风险做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在新征程中，面对重大风险，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要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坚实国力应对挑战，有足够的底气、能力、智慧战胜各种风险考验，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站在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努力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昂扬进发。

（执笔：陶文昭 温祖俊）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前提是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突出位置。近年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在诸多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环境保护修复任务仍十分艰巨。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协同推进和系统方案。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是一个整体，应当用系统性思维统筹各地改革发展、各项区域政策、各领域建设、各种资源要素，促进长江经济带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

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关键在于协同推进。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出发，开展长江生态环境普查，系统梳理和掌握各类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的整体预案和行动方案，然后分类施策、重点突破，使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一是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协同保护体制机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和壁垒，有效利用市场机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加快形成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流域管理统筹协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建立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明确各地区环境容量。完善长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和预警应急体系，推行环境信息共享，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跨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建立区域联动机制。加快建立健全以“谁受益谁补偿”为原则的生态补偿机制，激发沿江省市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动力。坚持整体推进，增强各项措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坚持重点突破，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

二是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是不发展了，而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共抓大保护和生态优先讲的是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不搞大开发和绿色发展讲的是经济发展问题。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坚定不移保护绿水青山这个“金饭碗”，实现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协同推进。

三是各地区要把自身发展放到协同发展的大局之中。长江经济带覆盖多个省市，其中各个地区、每个城市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一定要从整体出发，把自身发展放到协同发展的大局之中，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有机融合，形成整体合力。沿江城市群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应结合所在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放在长江经济带条件“一盘棋”中研究提出差异化协同发展的目标和举措。各大小城市在明确自我发展定位和方向时应立足整个城市群的发展方向，找到自身已错位发展的重点方向，解决好同质化发展的的问题。同时，要强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有效适应全流程完整性管理的要求。

四是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协同推进环境治理。长江沿岸长期积累的传统落后产能体量较大、风险较多。要拿出决心和勇气，积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能，破除无效供给，为新动能创造条件。留出空间，进而致力于培育发展先进产业。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要下大气力抓好落后产能淘汰关停，采取提高环保标准、加大执法力度等多种手段，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并协同推进环境治理。

本版编辑 赵登华

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关键在于协同推进

□ 何勇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找准突破口

□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五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提出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对此，我们要深入理解把握，找准突破口和发力点。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是必然选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都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但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在一些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客观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了“弯道超车”的机遇，也凸显了加快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紧迫性。因此，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多措并举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贯彻落实“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部署，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需要多措并举。一是要下好基础研究“先手棋”。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是技术研发的源头活水，只有夯实基础研究，才能为科技实力的持续增长备足后劲。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资源存在分散、重复、融合度低等问题，迫切需要瞄准战略必争领域和前沿方向，打破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集合精锐力量，创造更多“从0到1”的原创成果，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为此，《建议》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同时，还要通过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布局重大科

技项目、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等举措，推进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二是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基础研究需要长期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同时也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军。《建议》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通过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等针对性举措，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三是要激活人才“第一资源”。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建议》提出，“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并在健全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加强学风建设、深化院士制度改革、健全创新激励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举措。这将有利于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充分释放广大科技人员勇于创新、乐于创新的巨大潜能，把我国科技人员数量优势转化为科技创新质量优势。

（执笔：马一德）